国学 文化周刊

与赋在汉代兴起的同时,赋的研究——赋学,也伴之而生,并沿着与赋发展不同的轨迹前进。赋学在整个古代文学批评史上的发展,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。在本文中,复旦大学徐志啸教授拟对这四个阶段的发展沿革作极简略的概述:从两汉时期即赋学史的发轫期说起、从最早对赋及其创作发表见解的司马相如说起;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赋学呈现出的特点,曹丕、陆机、萧统等人在他们各自论著中表述的看法与见解;唐、宋、元三代何以成为赋学的低谷期,唐宋两代的论赋文字为何只沿袭前代观点,却无甚新见;及至明清两朝,赋的编集与评论出现了空前兴旺景象,非此前任何时代可比,清代赋学在整个赋学史上成为一个高潮阶段。

赋学极简史

■徐志啸

【两汉赋学】

两汉是赋产生和发展的黄金时期,也是赋学史的发轫期,可以说,赋的研究与赋本身的兴起几乎堪称同步。

最早对赋及其创作发表见解的,据史料记载,是司马相如。司马相如本人是个赋大家,一生创作了不少有影响的赋,在汉代赋坛乃至整个赋史上,均甚有地位与影响,因此,他直接阐述对赋创作的看法,颇能鞭辟入里。《西京杂记》载录了他回答盛览作赋方法的一段话:

"合纂组以成文,列锦绣而为质,一经一纬,一宫一商,此赋之迹也。赋家之心,苞括宇宙,总览人物,斯乃得之于内,不可得而传。"

司马相如在这段话中提出了"赋迹"与"赋心"两个概念:"赋迹",讲赋的形式,是对赋的文体特征的认识,认为作赋须辞藻华美、音律和谐;"赋心",是作赋的方法论,说明赋家创作赋时要对外界事物作艺术概括;两者均与赋本身及创作赋的实际要求基本相符。这是历史上最早论赋的文字。

与司马相如差不多同时代的司马迁,在《史记·司马相如列传》与《太史公自序》中分别评论了司马相如的赋创作:

"相如虽多虚辞滥说,然其要归,引之节俭,此与《诗》之风谏何异?"

"《子虚》之事,《上林》赋说,靡丽多夸,然其指风谏,归于无为。"

司马迁既肯定了司马相如赋的成就:"引之节俭","与《诗》之风谏何异",也指出了他的不足:"多虚辞滥说","靡丽多夸",这开了赋学史上评论赋家及其作品的风气之先。

汉代对赋采取始肯定后否定态度的,是扬雄。扬雄起初"好辞赋",钦慕司马相如的"弘丽温雅",下决心模拟之;然而赋的"靡丽多夸"的形式与实际讽谏作用之间的矛盾,使曾创作过《甘泉》《羽猎》《长杨》等赋(系模拟司马相如《子虚》《上林》之作)的扬雄,开始认识了赋的局限与弊端,他决心弃而不为,并为此予以贬抑,曰:"或问,吾子少而好赋?曰:然。童子雕虫篆刻。俄而曰:壮夫不为也。"扬雄之所以认为作赋是"童子雕虫篆刻","壮夫不为",主要因为赋并不能真正起到讽谏作用,它"极靡丽之辞",只是让读者欣赏其华丽的词藻,以达到娱人耳目的作用。《汉书·扬雄传》载:"雄以为赋者,将以风之,必推类而言,极靡丽之辞,闳侈钜衍,竟于使人不能加也。既迺归之于正,然览者已过矣。往武帝好神仙,相如上《大人赋》,欲以风,帝反缥缥有凌云之志。繇是言之,赋劝而不止,明矣。"鉴于此,扬雄将赋分成"诗人之赋""辞人之赋"两类,他认为,此二者虽均具"丽"的特征,但并非所有赋家的作品都能划一,其中一部分是"丽以则",另一部分是"丽以淫","丽以则"者系诗人所作,"丽以淫"者乃辞人所为,将诗人屈原与辞人代表司马相如作比较,屈原"上援稽古,下引鸟兽",其著意,是"过以虚"而"华无根"的司马相如"亮不可及"的。扬雄这一分类评价,具有一定的理论概括性,指出了赋忽略思想内容、崇尚靡丽形式之弊,对后代影响颇大。

两汉时代对赋作多方面评价的,是东汉的班固。班固论赋,主要体现于《两都赋序》,另外,他在《汉书·艺文志》中特设"诗赋略",其中论述虽多引刘歆《七略》,却也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他个人的一些看法。他对赋论的见解主要包括:第一,简要概括地叙述了赋的产生及其在西汉两百多年中的历史发展;第二,肯定了汉赋歌功颂德的思想内容("抒下情而道讽谕""宣上德而尽忠孝"),称汉赋是"雅颂之亚","炳焉与三代同风";第三,不赞同扬雄对辞人之赋的批判,肯定司马相如作品的积极意义及历史地位;第四,在《汉书·艺文志》中特立"诗赋略",将诗赋作品分为屈原赋、陆贾赋、孙卿赋、杂赋、歌诗等五类,既是文学与学术著述分离意识的早期萌芽,也是重诗赋的体现。从班固论赋见解可以看出,他对赋的看法有其片面性,过分注重了赋的文辞及歌功颂德内容,这同他贬斥屈原及其作品的观点基本一致,《离骚序》中他说:"今若屈原露才扬已,……亦贬絜狂狷景行之士,……谓之兼诗风雅而与日月争光,过矣。"但他对屈原作品的艺术形式,却持肯定态度:"然其文弘博丽雅,为辞赋宗,后世莫不斟酌其英华,则象其从容。"(《离骚序》)承认屈原作品在艺术形式上是汉赋之宗。

【魏晋南北朝赋学】

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赋学,呈现以下三个特点:一、这一时期比较重要的批评家,如曹丕、陆机、刘勰、萧统、颜之推等,均有论赋文字或文章,说明赋在这个时期虽地位、影响不如汉代,但依然是文坛上一宗,被视为独立文体,著评家甚多;二、晋代出现了赋学专文,如左思的《三都赋序》、皇甫谧的《三都赋序》等,较之两汉,它们对赋的研究与评论,似更理论化、系统化;三、体大思精的《文心雕龙》一书,不仅有《诠赋》专章,且全书它章中也多次论及赋、赋家及其作品,构建了独特的赋学体系,对汉代以来赋的理论作了系统的总结与创造性的理论阐发。

曹丕、陆机、萧统等人在他们各自论著中,均表述了对赋的看法与见解,从他们的论述中可以看出,其共同点是能抓住赋的根本特征,如曹丕在《典论·论文》中说:"夫文,本同而末异,盖奏议宜雅,书论宜理,铭诔尚实,诗赋欲丽。"一个"丽"字,突出了赋的特点。陆机《文赋》较曹丕概括得更为具体、明确:"赋体物而浏亮",把赋的文体特征与赋本义联系起来,抓住了实质。萧统的《文选》虽是一部文学作品选本,却也体现了萧统的文学观点,不论文章的选择编排,还是《序》中所阐述的,都表现出重文采、重辞赋的鲜明倾向。他的选文标准是"能文为本",所谓"能文",即指辞藻、音律等语言技巧。他将辞赋列于卷首,《序》中首论赋,而后依次为诗、箴、论等文体,也可见赋在他心目中的地位。

晋代左思与皇甫谧的两篇《三都赋序》与挚虞《文章流别志论》论赋部分文字,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值得注意的赋学论著。左思《三都赋序》提出了与前人不同的论赋标准,他认为,赋不能过于虚夸,其内容、文辞的取材应有根据,《序》中说:"盖诗有三义焉,其二曰赋。……先王采焉,以观土风。见'绿竹猗猗',则知卫地淇澳之产;见'在其版屋',则知秦野西戎之宅;故能居然而辨四方。"他自己所撰《三都赋》也实践了这一标准——辞必征实,按照这一标准,左思指责汉代赋家作品中不少记载失实之处。左思的指责,应该说有其一定意义,批评了汉代赋家文采过于虚夸之弊,但他一味追求"征实",强调知识的真实,则不免失之偏颇,混淆了文学作品与学术论著的区别。

皇甫谧的《三都赋序》为赞誉左思的《三都赋》而作,因而在赋的内容须"征实"方面,毫无疑问地与左思如出一辙。不过,皇甫谧并非单纯赞誉左氏之作,它同时阐发了自己对赋的看法:一、重视并强调赋的艺术表现形式,认为赋应是"美丽之文"——"文必极美""辞必尽丽",如不符"美""丽",便称不上赋,据此,他肯定了汉代一些赋家在艺术形式方面的成就:"初极弘侈之辞,经以约简之制,焕乎有文,蔚尔鳞集,皆近代辞赋之伟也";二、比较详尽地论述了赋自产生以来的概况,并对主要代表作家作了评论,所论文字,有褒有贬,不偏不激。

挚虞的《文章流别志论》是一篇探讨各种文体性质及源流的专论,其中论赋文字,对赋提出了一些见解。挚虞显然受扬雄观点影响,对"辞人之赋"持明显贬抑态度,文中说:"前世为赋者孙卿、屈原,尚颇有古诗之义,至宋玉则多淫浮之病矣。"文中指出,辞人之赋有"四过":"夫假象过大,则与类相远;逸辞过壮,则与事相违;辨言过理,则与义相失;丽靡过美,则与情相悖。"这"四过"的危害是"背大体而害政教",造成"四过"的原因是辞人们忽略了思想内容,太偏重形式,"以事形为本,以义正为助",这说明,挚虞比较重视思想内容。另外,他在论述"七"体时,述及枚乘《七发》,认为其既具讽喻意义,又开后世淫丽之先,比较符合事实。

刘勰对赋的理论见解,主要体现于《诠赋》篇,其他篇章也有涉及。他的观点总起来看包括以下几点:首先,明确了"赋"的真切含义及其源流。刘勰以前,对赋究竟是什么,从何起源,争论颇多,刘勰在列举前人论述基础上,指出:赋是《诗》六义之一,"赋者,铺也,铺采摛文,体物写志也。"而作为文体的赋,则"受命于诗人,拓宇于《楚辞》",其始端为荀况的《礼》《智》,宋玉的《风》《钓》,赋家枚乘、贾谊、司马相如、扬雄等均为楚辞所"衣被"。刘勰对赋所作的这一定义,较准确地抓住了赋的实质,对赋体起源的阐说,"讨其源流,信兴楚而盛汉",符合赋产生发展的实际,可谓不移之论。他又指出了大赋与小赋的特点及其区别——《诠赋》篇中,按赋作品的不同特点,分为大、小赋两类,大赋是:"京殿苑猎,述行序志,并体国经野,义尚光大。既履端于倡序,亦归余于总乱。序以建言,首引情本;乱以理篇,迭致文契。……斯并鸿裁之寰域,雅文之枢辖也。"小赋是:"草区禽族,庶品杂类,则触兴致情,因变取会。拟诸形容,则言务纤密;象其物宜,则理贵侧附。斯又小制之区畛,奇巧之机要也。"很显然,在刘勰看来,所谓大赋,题材较广,有序有"乱"辞,艺术特征典雅;所谓小赋,题材较狭,描写细密,艺术特征奇巧。刘勰的这一大、小赋分类,以后成了文学史上赋的分类名词,一直沿用至今。不过,他的概括,还尚欠全面,尤其是对特征的概括——大赋并非无奇巧,小赋亦非纯奇巧。刘勰还总结了赋的创作原则,《诠赋》篇指出,"立赋之大体"应是:"义必明雅","词必巧丽","丽词雅义,符采相胜;如组织之品朱紫,画绘之著玄黄;文虽新而有质,色虽糅而有本"。在刘勰看来,作赋必须符合内容与形式两方面要求,缺一不可,倘若舍本逐末,只追求文采,不讲究内容,则"虽读千赋",也会"愈惑体要",结果"繁华损枝,膏腴害骨;无贵风轨,莫益劝戒"。可见,刘勰既重视赋的文辞标准,要求"写物图貌,蔚似雕画",也坚持"体物写志""情以物兴""风归丽则,辞剪美稗",要求内容与形式的统一与完美。对战国以迄魏晋有代表性的赋家及其作品,刘勰一一作了评判,有客观惬当之论,也有失之公允之说。例如,说"陆贾扣其端,贾谊振其绪,枚马播其风,王扬骋其势",符合汉赋发展实际,评价也恰如其分;说"相如《上林》,繁类以成艳","文丽而用寡者长卿","子渊《洞箫》穷变于声貌","延寿《灵光》,含飞动之势",击中肯綮;然举魏晋杰出赋家代表,却不适当地抬高了郭璞、袁宏,而忽略了江淹、鲍照、庾信,失之偏颇。他指出诗人创作是"为情而造文",辞人作赋是"为文而造情"——诗人创作"志思蓄愤""吟咏情性",是"为情而造文",符合文学创作规律,作品富有艺术价值,乃"约而写真";而辞人创作,"心非郁陶,苟驰夸饰,鬻声钓世",乃"为文而造情",因而其文"淫丽而烦滥"。刘勰在这里实际上是提出了文学创作的根本规律问题——"为情造文",是符合客观规律的,反之,则颠倒了创作顺序,难以产生具有艺术价值的作品。

【唐宋元赋学】

唐、宋、元三代是赋学的低谷期,无论赋的研究者抑或有关赋的论文、著作,均少于唐以前和元之后,其原因恐怕主要是因为赋在这三朝处于衰落期。其时,"正宗"的形似汉赋之赋已几乎不可见,文坛所产生的赋,要么谈不上艺术价值,纯为考士而制的律赋,要么是名为赋而实属散文的文赋。不过,唐宋元三代还是出现了一些论赋的文字,它们大致反映在唐代一些史学著作和宋代一些文人的《诗话》及序、书信之中。值得注意的是,这三代中出现了一部比较系统的论赋著作——元人祝尧编的《古赋辨体》,此书主要为汉魏六朝赋作品作注,同时辨析赋的特征、赋文体的源流,并对各代赋家及其作品予以评论,是一部有价值的赋学著作。

祝尧《古赋辨体》的论赋主要包括三方面内容:辨赋体、论赋家、析赋作。对赋体,祝尧引证前人观点,指出:楚骚乃赋之祖,而骚又由诗变之,因而为赋者,须深谙诗骚,并辨明诗骚之异同("异同两辨,则其义始尽,其体始明"),方能"情形于辞""意思高远","辞合于理,旨趣深长"。为此,祝氏"以历代祖述楚语者为本,而旁及他有赋之义者,固附益于辨体之后,以为外录,庶几既分非赋之义于赋之中,又取有赋之义于赋之外,严乎其本,通乎其义",以一助赋家辨明赋义;同时,为使赋体源流能清晰可辨,祝氏在"外录"部分的骚与赋之中,特列"后骚"部,居"屈宋之骚"之后、赋之后。

特别应该提到的,是祝氏对赋的情辞关系的论见,他认为,"辞人所赋,赋其辞","诗人所赋,赋其情"。"古之诗人",均因对古、今、事、物有情怀感触才下笔作赋,故其辞为情怀感触之寄托,而"后之辞人"则不然,作赋唯恐"一语未断""一字未巧""一联未偶""一韵未协",求妍求奇,结果"情直外焉"。祝氏以情、理、辞三者作为评判赋家作品的准则,指出,为辞"须就物理上推出人情来,直教从肺腑中流出,方有高古气味","本于人情,尽于物理,其词自工,其情自切,使读者莫不感动"。可见,他视情为赋之本,理为情之辅,认为情理尽则辞自工,这一方面体现了重作品思想情感内容,有其正确性和合理性,另一方面则也同时暴露了他忽略辞采作用的偏颇。如此,祝氏甚至提出了辞"一代工于一代",而"辞愈工则情愈短,情愈短则味愈浅,味愈浅则体愈下",从而认为,自先秦至三国六朝,赋一代不如一代。这显然不符合赋的实际发展事实。祝氏认为"辞之所以动人者,以情之能动人也",有情才能动人,无情则辞再工亦枉然,这自然是对的,尤其就赋的过分追求辞藻而言,此话击中了要害;但他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,过分讲究情理,忽视了辞的作用,陷入了片面,将辞与情完全对立了。从先秦到三国六朝,赋并非一代不如一代,体式虽有变,大赋转化为小赋,然则小赋未必不如大赋,后代未必不如前代,这是历来赋家评论几乎公认的。

《古赋辨体》的主要篇幅,是对赋家及其作品的论析,祝氏在这方面颇花了笔墨,全书论及汉魏六朝赋家近二十位,作品二十余篇,数量之多,范围之广,为汉以迄之冠。这些评述,相当部分为赞同、承袭前人说法,也有部分乃祝氏个人看法。例如,论荀卿赋,云"既不先本于情之所发,又不尽本于理之所存",与风骚相比有差异,所言甚是;又如,评价司马相如谓:"《子虚》《上林》较之《长门》,如出二手,《子虚》《上林》尚辞,极靡丽,不本于情,无深意远味,而《长门》情动于中形于言,不尚辞而辞在意中",颇有道理;又如,对扬雄好用奇僻字甚为不满,谓:"益趋于辞之末,而益远于辞之本也。"贬《长杨赋》曰:"此等之作,虽曰赋,乃是有韵之文,并与赋之本义失之噫!"击中要害;再如,评价祢衡《鹦鹉赋》云:"凡咏物题,当以此等赋为法",所言甚当。这些评论无疑有助于后人对赋家及作品的认识与理解。

唐宋两代的论赋文字,基本上沿袭了前代观点,无甚新见。值得一提的是南宋朱熹的《楚辞后语》,它虽说是《楚辞集注》中的一部分,主要篇幅与旨意均为研究楚辞而作,但其中论及赋家的一些见解,可以参考。如注司马相如《哀二世赋》时提出,司马相如的作品"能侈而不能约,能谄而不能谅",其《子虚》《上林》两篇因"夸丽而不能入于楚辞",《大人赋》"终归于谀","《哀二世赋》是"顾乃低徊局促,而不敢尽其词焉,亦足以知其阿意取容之可贱也"。应该承认,从司马相如作品的思想内容及他的创作动机来看,朱熹的这些话是一针见血的,只是就全面衡量一个作家而言,他谈"义理"多了些,论艺术价值少了些。不过,对班婕妤的《自悼赋》,朱熹却是予以了高度评价;"至其情虽出于幽怨,而能引分以自安,援古以自慰,和平中正,终不过于惨伤。"认为其与《柏舟》《绿衣》(均《诗经》作品)"词义同美",班本人是"德性之美,学问之力,均有过人处"。朱熹之褒贬于此可见一斑。

【明清赋学】

明清时期,是赋学史上的多产期,这一时期,虽然赋的创作在文学史上已几乎不被提及(文赋、律赋的创作仍有,且清人有"当代"赋集问世,如《赋海大观》等),但赋的编集与评论,却出现了空前兴旺景象。据笔者粗略统计,从西汉至清末民初,所有论赋作者与文章,明清两代占了近半,而实际文字,则更远超半数,非此前任何时代可比。不过,这一时期的赋学资料,以辑录、沿袭前人观点者居多,而抒己见、自成理论体系者较少。在编集出版方面,这一时期出现了《历代赋汇》《七十家赋钞》《赋钞笺略》等大部头编著,也产生了收录历代有关赋文字的《赋话》(清人李调元编),此书虽非赋学专著,然对赋学研究无疑也是个贡献。另外,一些诗话著作中对赋也有涉及,其中有些同时融入编著者个人见解,如明人胡应麟的《诗薮》、清人刘熙载的《艺概·赋概》等。

明人胡应麟的《诗薮》,是一部评论历代诗歌的诗话,由于作者广涉文史,学问淹博,因而书中征引甚富,特别对赋家作品篇目与渊源、继承的考证、阐说,较细微,其品评文字,虽承袭前人之说颇多,且往往以王世贞《艺苑卮言》为准,然也有可取之处。如他认为,骚与赋艺术形式上的区别主要在于:骚复杂无伦,以含蓄深婉为尚,赋整蔚有序,以夸张弘距为工;骚赋的兴衰变化各为:骚盛于楚,衰于汉,亡于魏;赋盛于汉,衰于魏,亡于唐。他指出,骚与赋是两种文学体裁,前人总好统称,混而不分,自萧统《文选》分骚赋为二后,历代便承因之,使名实相符。由于《诗薮》一书受《艺苑卮言》影响较大,而后者基本上以辑录为主,涉赋部分几乎无甚创见,这自然也就限制了《诗薮》的发挥。

清人程廷祚的《骚赋论》是一篇有价值的赋学论文,该文较详尽地辨析了骚与赋的共同特点与迥异区别,对历来这两种文体的混淆看法作了必要的澄清。程氏的辨析从区别诗、骚、赋三者同异入手,他认为,此三者有渊源承续关系:诗是骚、赋之源,诗之变而后有骚,骚之体流而成赋,"赋体类于骚而义取乎诗"。然后,他又指出骚与赋的不同:骚近于诗,"具恻隐、含讽喻",赋则"专于侈丽闳衍之词","有助于淫靡之思,无益于劝戒"。在辨析骚赋同时,程氏评论了自荀宋至魏晋历代赋家的特点及发展状况。他称道贾谊、司马相如,说:"贾生以命世之器,不竞其用,故其见于文也,声多类骚,有屈氏之遗风。""长卿天纵绮丽,质有其文,心迹之论,赋家之准绳也。"他认为,西汉一代,"首长卿而翼子云","赋家之能事""至是"毕;东汉则"体卑于昔贤,而风弱于往代",然"赋至东京,长卿、子云之风未泯,虽神机不足,而雅赡有余"。

清代王芑孙的《读赋卮言》一书分导源、审体、谋篇、小赋、律赋、序例、总指等部类,旨在帮助读者理解赋作品,虽书中所论赋内容多系前人成说之汇集,但著者的上述分类,对读赋者无疑是一种指途识津,有一定启发。

李调元的《赋话》全部辑录历代有关赋的文字,内容包括赋义辨析、赋体源流、赋家及作品评论、赋家轶事等,范围上自汉初,下迄明清,包括史书、诗话、小说、字书、笔记等多方面资料,分新话、旧话两部分,新话侧重作赋之法、赋之声律,旧话主要为历代赋话。该书特点是:辑录时间跨度长、汇集材料范围广、内容较丰富。但是,我们也应指出,该书着眼点是赋"话",而非赋论,且编者偏重于"作赋之法门",因而,总体上看,收录赋家名人轶事多,谈赋之作法多,真正论述赋文字少,而且书中难以见出编者个人的理论见解,这多少是个缺憾。

刘熙载《艺概》是一部谈各种文体艺术的著作,全书涉及范围广泛,包括《文概》《诗概》《赋概》《词曲概》等,其中《赋概》部分作者以简炼的语言,"触类引申",对赋家及其作品、赋体形式流变、赋的艺术特点,在总结汲取前人研究成果基础上,提出了一些不囿于传统的有识之见。

清末章炳麟《国故论衡·论诗》对《汉书·艺文志》分赋为四类的原因作了阐述,值得一说。章炳麟指出,赋分四家,乃按内容不同而分:第一类,屈原赋,言情之赋;第二类,陆贾赋,纵横家之赋;第三类,孙卿赋,"写物效情"之效物赋;第四类,杂赋,杂咏之赋。章炳麟对赋的这一分类,有助于人们对两汉刘歆、班固赋分类的理解,和对赋作品内容特征的认识区分。

毫无疑问,在整个赋学史上,清代赋学是一个高潮阶段。